

# 古代埃及人的外族观念

金 寿 福

**内容提要** 古代埃及人早期有关外族的概念主要受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的影响。王权产生以后,统治者把外族问题政治化和仪式化,试图借此来强调手中权力的合法性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必要性。综合分析古代埃及统治阶层的宣传性文献,并对照考古发掘结果,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埃及人对外族的想象和与外族的实际交往情况。

**关键词** 古代埃及 外族 王权

## 一、受地理环境影响的“外族”概念

古代埃及人所居住的区域主要由尼罗河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组成。这片土地具有独特的地理和气候特征,四周由海洋、沙漠和山脉形成自然屏障。埃及人甚至在名称上严格区分自己的国度与其他地区。他们把自己的居住地称为“黑土地”(kmt),把其他地区一律称为“山地”(h3st)或“沙漠”(d3rt)<sup>①</sup>。他们把埃及这块肥沃的土地看作是象征新生和秩序的神荷鲁斯的领地,荷鲁斯的死对头塞特神则被认作埃及以外土地的掌管者<sup>②</sup>。埃及人认为尼罗河随季节发生有规律的水文变化是秩序和恒定的象征,依赖雨水的其他地区则象征混乱和无常。埃及人的来世观念与他们所处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密切相关,他们认为尼罗河以西太阳降落的地方是死者的归宿,也是死者起死回生所需的坟墓的所在地<sup>③</sup>。根据这一来世观念,墓室里的死人只有依靠他生前所供奉的神的指引才能顺利到达来世,并且依靠亲属不间断地提供食品才能维持第二次生命。

尼罗河三角洲以西的利比亚人、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的努比亚人和西亚地中海沿海的西亚人很早便与埃及人有频繁接触。埃及人通常将这些西北部、南部和东北部的的外族统称为“九张弓”<sup>④</sup>,暗

<sup>①</sup> 艾尔曼:《埃及语词典》(Adolf Erman, *Wörterbuch der ägyptischen Sprache*),柏林 1961年版,第 5 卷第 126 页,第 3 卷第 234 页,第 5 卷第 494 页。

<sup>②</sup> 库尔特·塞德:《第十八王朝文献汇编》(Kurt Sethe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莱比锡 1927 年版,第 17 页。

<sup>③</sup> 金寿福:《征服死亡的尝试——论古代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动机和目的》《社会科学战线》2002 年第 4 期;《论新王国时期埃及人的生死观》,《世界历史》2007 年第 3 期。

<sup>④</sup> 艾尔曼:《古代埃及文学》(Adolf Erman, *Die Literatur der Ägypter*),莱比锡 1923 年版,第 283—284 页。

含这些民族处于游牧状态并好斗之义。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居住在尼罗河三角洲西北部不远处的利比亚沙漠里的人,很早便使用埃及语<sup>1</sup>。这说明埃及人在语言上与附近沙漠里的游牧民没有本质区别。这些游牧民在服饰方面也与埃及人没有明显不同<sup>④</sup>。尽管如此,埃及人仍把他们称作“利比亚人”。生活在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南的居民在服饰上与埃及人也几乎一样,但是在埃及人的地理概念中,尼罗河第一瀑布构成了埃及最南的边界,加上这个地区的居民以畜牧业为生,埃及人始终称他们为“努比亚人”<sup>④</sup>。

古代埃及人留下许多描写上述三个民族的文字和图画,强调和夸张了这些外族人的某些生理和服饰特征<sup>1/4</sup>。在他们眼里,这些特征违反了审美标准和生活理想。遮盖下身的遮羞布、胸前的十字背带、剃光的头皮上的一缕头发是利比亚男人的特征<sup>1/2</sup>;络腮胡子、用一个带子系在一起的长发、宽松的袍子是埃及人对西亚人的典型化描写<sup>3/4</sup>。有时埃及人着意突出西亚人棱角突出的头和剃成平头的短发以及小却微微翘起的鼻子,以便让这些特征与自己戴着假发和长着平直鼻子的形象形成对比<sup>⑧</sup>。在图画和浮雕上,埃及人与外族人之间在姿态、表情、大小比例等方面都存在差别。埃及人显得高大和庄重,而外族人看上去矮小和猥琐。一个埃及人,哪怕他是很普通的仆人,也呈现出在埃及人自己看来显得端庄的坐相和站相;只有外族人才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sup>(1)</sup>。埃及人把外族女子刻画得非常丰满,以此来暗示她们尚未开化,有很强的繁殖力<sup>⑩</sup>。埃及人夸大自己与西亚人在外表和人格方面的差异,并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归于各自所处的不同的自然环境。他们把自己的优越感建立在土地的肥沃、物产的丰富以及政局的稳定上,同时将外族所处的自然环境与其野蛮性和游动性之间划上等号。有一篇说教文指出,西亚人苦于居住环境的恶劣,从不在一个地方定居,为了食物而流动;他们善于偷袭和隐藏,像贼一样避开对方的锋芒,像潜伏在岸边的鳄鱼一样在隐蔽处进行偷袭<sup>10</sup>。在一段

<sup>1</sup>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希腊人之间达到认同的标准是血缘、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20—621页。

④ 沃尔夫冈·海尔克:《埃及与西亚关系史》(Wolfgang Hek, *Die Beziehungen Ägyptens zu Vorderasien*),威斯巴登1971年版,第23—35页。

④ 艾尔曼:《埃及语词典》第2卷,柏林1961年版,第303页。

<sup>1/4</sup> 马雷克编:《埃及4000年艺术》(Jaromír Málek, *Egypt 4000 Years of Art*),伦敦2003年版,第197页。

<sup>1/2</sup> 霍勒舍尔:《利比亚人与埃及人》(W. H. L. Scher, *Libyer und Ägypten*),格吕克斯施塔特1937年版,第98页。史前和早王朝时期的埃及人的装束与此相差无几,在后期庆祝胜利的场合和宗教仪式中,埃及国王的装扮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也曾经经历过三角洲边缘居民的游牧生活。

<sup>3/4</sup> 勃夏德:《萨胡拉国王的祭庙》(Ludwig Borchardt, *Der Totentempel des Königs Sahu-Re*),莱比锡1913年版,附图第5幅。按照古代埃及人的审美标准,只有体力劳动者和社会低下阶层的人才留长发和胡子,而有身份的人则剪短发和刮净胡子,在需要表现头发和胡须的特殊场合佩戴假发和假胡子。

⑧ 齐格勒:《埃及法老》(Christiane Ziegler, *The Pharaohs*),纽约2002年版,第236页。埃及人的衣服以白色和浅色为主色调,很少穿深色的衣服。古代埃及人所描述的西亚人穿着很艳丽,甚至男人们也穿带花纹的衣服。哈格恩:《埃及:人、神和法老》(Rose-Marie Hagen, *Egypt People, Gods and Pharaohs*),科隆2002年版,第96—97页。

(1) 在卡纳克神庙第十塔楼墙壁上,一个赫梯男人被刻画成女人的样子。19世纪末一个研究古代埃及艺术的学者把他当作女人,后来的学者们对旁边的象形文字解说词才纠正了这个错误。范德斯莱恩:《古代埃及》(Claude Vandersleyen, *Das alte Ägypten*),柏林1975年版,第54页。

⑩ 在哈特舍普苏特女王为自己和阿蒙神建造的神庙墙壁上,生活在非洲东北部的妇女描画得矮胖,且臀部特别突出。韦斯特多夫:《古代埃及:法老的艺术》(Wolfgang Westendorf, *Das Alte Ägypten: Die Kunst der Pharaonen*),巴登-巴登1968年版,第29—46页。

<sup>10</sup> 库瓦克:《马里卡瑞说教文研究》(J. F. Quack, *Studien zur Lehre fuer Merikare*),威斯巴登1992年版,第52—55页。

劝说年轻人用心读书的文字里,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描写了一个被派遣到巴勒斯坦地区的埃及士兵的悲惨和危险境地。那里小路崎岖,布满了石头,右面是深谷,左面是悬崖。埃及士兵几经周折才到了一块开阔地,却又担心有敌人隐藏在灌木丛中<sup>1</sup>。尽管文中有许多想象和夸张的成分,但还是反映了习惯于平缓和开阔地理环境的埃及人初到西亚以后所感受到的不适与不安。

古王国末期的一个官吏在自己的墓室里记述了他的孝行。他不顾生命危险,把在埃及境外死去的父亲的遗体运回埃及并埋葬<sup>④</sup>。对于古代埃及人来说,尸体只有经过特殊的处理,以符合宗教习俗的方式埋葬在设施完善、随葬品齐全的墓室里才有可能获得重生。在自传体作品《希努赫的故事》中,主人公希努赫叙述了他如何逃离埃及,最终回到埃及的经历。希努赫在西亚受到了一个贝都因部落首领的款待并得到其恩宠。首领甚至把自己的长女许配给他,还从自己的土地和牧群中选择最佳份额作为女儿的嫁妆。尽管财产与日俱增,家丁越来越多,面对暮年将至的现实,希努赫最终还是决定返回自己的家乡。他用一个疑问句表达自己的感慨:“有什么能够比我的尸体葬在我的出生地更为重要?”<sup>(四)</sup>

## 二、服务于政治的敌我观念

在统一的国家形成之前和形成初期,尼罗河河谷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居民从属于埃及的意识主要受地理和来世观念的影响;但在王权确立以后,古埃及统治者试图将埃及在政治意义上与文化意义上等同起来,进而在宗教层面上强化埃及人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差异<sup>¼</sup>。由此,疆域概念与民族概念超乎寻常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与周边地区及其居民的对立关系。埃及这块肥沃的土地被沙漠和山区所包围,居住在贫瘠地区的居民又对埃及虎视眈眈。按照古代埃及统治者的解释,无论是尼罗河河谷地两边的游牧民,还是三角洲两侧的利比亚人和西亚人,他们都时刻企图进入处于和平状态的埃及并引起混乱<sup>½</sup>。因此,守卫埃及的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国王的肩上,王权的必要性也不言而喻<sup>¾</sup>。古代埃及国王把自己形容为众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把那些生活在穷山恶水的居民抵御在埃及国土之外。

表现古代埃及统治者打击敌人的画面中最常见的是国王一手抓住一个或者多个敌人的头发,另一手举起权标头把对方的头盖骨敲碎。这一主题最早出现在前王朝时期的“那尔迈调色板”上<sup>⑧</sup>。统

<sup>1</sup> 丽希苔姆:《古代埃及文学》(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第2卷,伯克利1976年版,第171—172页。

④ 艾尔曼:《古代埃及文学》第11—13页。

(四) 丽希苔姆:《古代埃及文学》第1卷,伯克利1973年版,第222—233页。

¼ 基森:《拉美西斯时期的文献》(Kenneth A. Kitchen, *Ramessean Inscriptions*)第5卷,牛津1983年版,第86页。

½ 从古王国末期开始,古代埃及国王每当重要的节日都要举行一种叫做“摔碎红色陶器”的仪式。国王亲手把刻写敌人名字的陶器或陶像摔碎,然后由人把碎片埋入深坑里。奥欣:《来自古王国的诅咒性文献》(Jürgen Osing, “Ächtungstexte aus dem Alten Reich”),《德国驻开罗考古研究所通讯》(*Mitteilungen des Deutschen Instituts für Ägyptische Altertumskunde in Kairo*)第32期,1976年,第133—185页。

¾ 库瓦克:《马里卡瑞说教文研究》,第40—48页。

⑧ 彼得里:《用于宗教仪式的调色板》(W. M. F. Petrie, *Ceremonial Slate Palettes*),伦敦1953年版,附图第10幅。这类题材和这种表现手法在三千年时间里保持了形式和内容上的高度一致。施瓦茨编:《战争与胜利》(Mario Schwarz ed., *Krieg und Sieg*),维也纳2002年版,第20—87页。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涉及的是来自上埃及的国王在向北扩张的过程中征服下埃及的场面。

一的国家建立以后,遭受埃及国王打击和被征服的对象一律变成外族,而且这一主题的画面在王宫和神庙的墙壁上必不可少<sup>1</sup>。在埃及与西亚和努比亚交界处的石碑上或者在进入埃及的外族人必经之路的岩石上,古代埃及统治者都刻画了埃及国王击打敌人的场面。其目的是对外族起震慑作用,也是埃及国王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手段之一。

在《阿蒙内海特说教文》中,国王阿蒙内海特首先向儿子讲述了谨慎和区别对待王室成员、官吏和臣民的重要性,接下来又长篇叙述了自己的征战经历:“我驯服了狮子,我活捉了鳄鱼,我镇压了瓦瓦特(指努比亚北部)的居民,我让西亚人像狗一样摇尾乞怜。”<sup>④</sup>他将打猎与作战相提并论的目的是强调他的胆略,指出居住在埃及周边的民族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埃及这块井然有序的肥沃土地上生活;而他作为埃及的统治者,只有借助武力并且主动出击才有可能抵御这些外族的袭击<sup>⑤</sup>。有一首诗赞颂谢索斯特斯二世打击外敌、保卫埃及的功绩:“随着他双手的挥动,所有的外国都被他征服。他手中的权杖还没有落下,那些外国士兵已经倒地;他还没有拉起弓,箭已经飞出去。他的威力令那些外国人胆战心惊,他的凶猛令‘九张弓’闻风丧胆。他的声音使努比亚人却步,他的话语使西亚人逃之夭夭。”<sup>¼</sup>

利比亚人、努比亚人和西亚人不仅被比喻成需要驯服的动物或不堪一击的懦夫,甚至还被描绘成女人或象征邪恶的魔鬼。有一块碑文,上面记述了阿蒙荷太普二世对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米坦尼发动的军事行动。他把这些地区的统治者比作女人、少女、幼女和老太婆<sup>½</sup>。外族士兵在数量上绝对超过埃及军队,但随着埃及国王的临近而纷纷无力地倒下。画面上身材高大的埃及国王像超人一样屹立在如同侏儒般的外族士兵中间<sup>¾</sup>。许多时候,埃及国王只身一人或者对敌人大肆屠杀,或者把他们全部俘虏<sup>⑧</sup>。“以色列石碑”记述了梅内普塔转战南北、东征西讨,征服埃及周边敌人的战功:“他们(指利比亚人)的指挥官不见了踪影,士兵们没有反抗就逃窜,弓箭手把弓箭丢得到处都是,逃亡的士兵丧失了魂魄,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水袋抛弃。那些首领(指西亚地区的诸侯)匍匐在我面前,连声祈求和解;‘九张弓’无一敢抬头。巴勒斯坦被征服;叙利亚变得服服帖帖;迦南一无所有。阿什卡伦被我战胜,加沙被我打败,亚诺安不复存在,以色列的男子被我杀绝,克厄变成了依靠埃及的寡妇。”<sup>⑨</sup>拉

<sup>1</sup> 马雷克编:《埃及 4000年艺术》,第 142—143 页。古埃及第二十五王朝是由努比亚人征服埃及以后建立的。在卡瓦神庙的壁画上,可以看到身为努比亚人的塔哈克称自己是埃及和努比亚国王,并举起右手的权杖击打被抓在左手的利比亚人。而在原先类似题材的画面上,被击打的敌人通常包括西亚人、利比亚人和努比亚人。马卡丹:《位于卡瓦的神庙》(M. F. L. Macadam, *The Temples of Kawa*)第 2 卷,伦敦 1955 年版,附图第 9 幅。

<sup>④</sup> 艾尔曼:《古代埃及文学》第 73—74 页。

<sup>⑤</sup> 狮子等猛兽被喻为敌人时,象征必须被制服的邪恶势力;而当埃及国王被比作猛兽时,却象征正义。基森:《拉美西斯时期的文献》第 5 卷,第 63 页。有关国王捕杀狮子等动物的图画,参见齐格勒:《埃及法老》第 425 页;有关埃及国王打猎的图画,见马雷克编:《埃及 4000 年艺术》,第 251 页。

<sup>¼</sup> 阿斯曼:《古代埃及赞美诗和祈祷文》(Jan Assmann, *Ägyptische Hymnen und Gebete*),苏黎世和慕尼黑 1975 年版,第 130 页。

<sup>½</sup> 莱德弗泽:《古代的埃及、迦南和以色列》(Donal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普林斯顿 1992 年版,第 230 页。

<sup>¾</sup> 鲁斯曼:《永恒的埃及:来自大英博物馆的古代艺术杰作》(Edna R. Russman, *Eternal Egypt: Masterworks of Ancient Art from the British Museum*),加利福尼亚 2001 年版,第 69 页。

<sup>⑧</sup> 基森:《拉美西斯时期的文献》,第 2 卷第 321 页,第 4 卷第 19 页,第 5 卷第 13 页。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的图坦卡蒙也被描绘成驾着战车用弓箭射杀敌人。里甫斯:《图坦卡蒙汇集》(Nicholas Reeves, *The Complete Tutankhamun*),伦敦 2007 年版,第 189 页。

<sup>⑨</sup> 丽希苔姆:《古代埃及文学》第 2 卷,第 74—77 页。

美西斯三世把试图进入埃及的“海上民族”比作吓破了胆的小麻雀、落入陷阱的野兽、等待收割的庄稼,把自己形容为凶狠的隼、胆大心细的猎人、强壮的收割者,来犯之敌像装进粮仓的谷物一样成为埃及法老的囊中之物。他最后补充说,他的勇猛使敌人蜕变为女人<sup>1</sup>。

除了石碑和建筑物墙壁上的文字和图画以外,古代埃及统治者还用其他方式表达他们与外族为敌的意念。国王统一上下埃及的画面经常出现在王座的两侧,画面上分别代表上埃及和下埃及的荷花和芦苇联结在一起,象征埃及的统一;而荷花和芦苇茎的尽头则捆绑着努比亚人和西亚人,言外之意埃及的和平和统一是与外族的被征服和奴役相辅相成的<sup>④</sup>。在王座底座的画面上,几个作为外族代表的敌人在埃及国王的重压下奄奄一息,国王双脚的落地处刻画了几个被踩在国王脚下的敌人的形象<sup>⑤</sup>。在王宫入口处国王进出时的落脚处铺了一块有外族形象的烧砖<sup>⑥</sup>,埃及国王每次出入都能够把想象中的敌人踩踏一遍,令他们永无翻身的机会。从希拉康坡里斯出土的一块门墩上画着一个匍匐在地的敌人,其头部恰好位于门轴转动处,后脑勺已经被掏了一个深坑<sup>⑦</sup>。在图坦卡蒙墓里发现的一个手杖的把手处雕刻着两个外族人的头<sup>⑧</sup>,其中黑肤色者为努比亚人,浅肤色者为西亚人或利比亚人<sup>⑨</sup>。每当图坦卡蒙国王使用这个手杖,埃及周边的居民就被掌控在他的手心。王室成员特别是公主们佩戴的戒指、胸饰和手镯上经常有埃及国王击打外族或者被刻画成狮子的埃及国王撕咬敌人的画面<sup>⑩</sup>。这些首饰佩戴者希冀埃及国王的威力能够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危害。

古代埃及国王用文字、图画、雕塑等多种手段表现他们打击外族的功绩,目的是使王权合法化。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关于宇宙的起源和世界秩序的概念相关。在古代埃及神话中,象征生命和秩序的创世神在创世和促使生命循环的过程中遭到代表死亡和混乱的巨蟒的阻拦。只要有创造光明的太阳神,就有制造黑暗和混乱的魔鬼<sup>⑪</sup>。绿地与沙漠、泛滥水与干旱、健康与疾病、生命与死亡,这些出现在自然界和人世间的现象被看作是神与魔鬼不断斗争的表现和结果。在这个由二重性构筑的世界里,埃及人与外族人、埃及与外国成为对立的统一体。埃及国王声称,他们率领军队攻打周边地区是为了保卫埃及的和平<sup>⑫</sup>。从中王国开始,埃及国王在称呼外族时常要在其名称前加上“可怜的”或者“不敬神的”这类形容词<sup>⑬</sup>。

<sup>1</sup> 舒尔曼:《仪式性的杀敌和宣传》(A. R. Schulman *Ceremonial Execution and Public Rewards*),哥廷根 1988年版,第 91页。

<sup>④</sup> 齐格勒:《埃及法老》第 434—435页。

<sup>⑤</sup> 阿蒙荷太普三世用文字表达了这一画面:“我的脚下踩着努比亚人,我的勇猛让西亚人胆战心惊,我的双手攥紧了九张弓的脑袋。”海尔克:《第十八王朝文献汇编》,第 1666页。

<sup>⑥</sup> 马雷克编:《埃及 4000年艺术》,第 252—253页。

<sup>⑦</sup> 朗格:《埃及——三千年的建筑、雕塑和绘画》(Kurt Lange, *Ägypten Architektur Plastik Malerei in drei Jahrtausenden*),慕尼黑 1967年版,第 123页。

<sup>⑧</sup> 一些武器上也有类似的主题,如在匕首和斧子的把手刻画遭到埃及国王打击的敌人。

<sup>⑨</sup> 从图坦卡蒙墓还出土了一个鞭子,鞭子的把手被雕塑成埃及敌人的形象。里甫斯:《图坦卡蒙汇集》,第 162—178页。

<sup>⑩</sup> 马雷克编:《埃及 4000年艺术》,第 124页;埃格布莱特:《埃及的崛起》,第 237页。

<sup>⑪</sup> 艾伦:《埃及的创世记:古代埃及创世文献的哲学思想》(James A. Allen, *Genesis in Egypt: The Philosophy of Ancient Egyptian Creation Accounts*),纽黑文 1988年版,第 2—4页。

<sup>⑫</sup> 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时曾多次带兵攻打埃及以外的居民,他把自己的军事行动归因于这些人不停地图谋策反。海尔克:《第十八王朝文献汇编》,第 1231页。

<sup>⑬</sup> 这些限定性形容词最早出现在谢索斯特斯一世在位时期。S. 基贝里斯-兹恩:《埃及对努比亚的扩张》(S. Zibelius-Chen *Die ägyptische Expansion nach Nubien*),威斯巴登 1988年版,第 220页。

在古代埃及的创世神话中,只有埃及被纳入造物主有序的造物范围之内,而埃及以外的土地则被看作是需要治理甚至应当被消灭的混乱之源<sup>1</sup>。依循这种世界观,外族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恭顺地接受埃及的控制和掠夺,要么被消灭掉。埃及国王把自己比作埃及众神殿中的战神蒙特,把自己在西亚地区烧杀抢掠的行为说成是遵从神的旨意。不少新王国时期的国王都描述了他们摧毁外族的城镇,把居民当作俘虏,把牲畜和其他财物当作战利品,甚至还把井填死、把树木全部砍掉<sup>④</sup>。有的国王还复述了那些侥幸逃脱死亡的西亚人对别人所说的话<sup>(四)</sup>。在《阿纳斯塔西纸草》上,埃及书吏描述了被擒的敌人如何赞扬埃及国王的神性:“你就是拉神,你是举世无双的君主,你是照亮埃及和周边地区的太阳神,你的双手握着不可阻挡的利剑。让我们呼吸吧!”<sup>¼</sup>

在古代埃及神庙的结构和装饰上,埃及人与外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将外族与混乱和邪恶等同起来的观念都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神庙壁画上只能看到外族遭到埃及国王的打击和屠杀的场面,而埃及人与外族之间的交往却从未成为神庙壁画的内容<sup>½</sup>。古代埃及的神庙入口象征着进入埃及的通道,在入口处两侧塔楼的外墙壁画上,埃及国王手持权标头击打敌人的脑袋,体现了其保卫埃及免受外族入侵的能力和功绩。在神庙的其他外墙壁画上,埃及国王把他从国外带回的俘虏和战利品作为供品献给埃及众神,感谢众神让他获得了胜利<sup>¾</sup>。

### 三、被掩盖了的事实

表面上看,古代埃及国王们似乎把自己形容得与外族势不两立;事实上,他们对外族充满了好奇心,对来自外国的物品也很感兴趣。古代埃及从王朝初期就已经与西亚和非洲内陆地区保持贸易关系。平等的贸易关系却被说成是外族为埃及国王纳贡或送礼。交换来的物品不仅有埃及缺乏但必需的原料,如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白银、阿富汗的天青石和努比亚的黄金和乌木,还有埃及本地不产但埃及人喜欢的珍贵物品,如叙利亚的熊、努比亚以及以南地区的长颈鹿、猴子、象牙、鸵鸟蛋等<sup>⑧</sup>。根据古代埃及文献记载,非洲内陆生活着一些会跳舞的侏儒。其舞蹈不仅给人带来娱乐,而且能够传达神意。古王国末期的一个国王曾派遣庞大的队伍深入非洲内陆,目的是从那里带回一个会跳舞的侏儒。当国王得知俘获了一个侏儒后,便特地给领队的官吏写了一封信,命令他尽早地、安全地把侏

<sup>1</sup> 欧康纳编:《古代埃及王权》(David O'Connor: *Ancient Egyptian Kingship*),莱顿和纽约 1995年版,第 273—280页。

<sup>④</sup> 海尔克:《第十八王朝文献汇编》,第 1277页。拉美西斯二世在描写自己惩罚造反的努比亚人的时候用了同样的语气:“我如同隼神荷鲁斯一样突然降临在他们头上,就像蒙特一样势不可挡。我勇敢地杀死他们,并且砍下他们的手。共有 30000 个男人成为俘虏。”基森:《拉美西斯时期的文献》第 2卷,第 151页。

<sup>(四)</sup> 基森:《拉美西斯时期的文献》第 1卷,第 79页。

<sup>¼</sup> 在歌颂埃及国王的诗歌里,埃及周边的小国都被描写成争先恐后地给埃及国王送来各种贵重物品,目的是为了求得后者的恩惠,而那些原来试图造反的人则出于恐惧心理把自己变成了牲畜。艾尔曼:《古代埃及文学》,第 83—86页。

<sup>½</sup> 在图特摩斯三世为阿蒙神建造于卡纳克的神庙外部墙壁上,埃及艺术家把图特摩斯三世及其军队从西亚带来的奇花异草与埃及本地的植物融合在一起加以刻画。似乎来自外国的植物可以与埃及的植物共生。鲍乌:《图特摩斯三世珍奇动植物大厅》(Nathalie Beaux: *Le cabinet des curiosités de Thoutmosis III*),鲁汶 1990年版,第 314—318页。

<sup>¾</sup> 纳尔逊:《梅迪奈特—哈布》(H. Nelson: *Medinet Habu I*)第 1卷,芝加哥 1930年版,第 30—34页。神庙的内部墙面专门用来表现众神为国王举行加冕典礼或者国王为众神庆祝宗教仪式的题材。

<sup>⑧</sup> 勃夏德:《萨胡拉国王的祭庙》,附图第 11幅。

儒带到王宫<sup>1</sup>。

从古王国中期开始,许多努比亚人被掳到埃及当劳工<sup>④</sup>。也有的人是迁徙到埃及的,其中不少人被编入埃及军队,担负保护去往巴勒斯坦地区商队或者对该地区实行惩罚性军事行动的任务<sup>⑤</sup>;他们有时也会被派往尼罗河以东沙漠地区的采石场,开采埃及国王需要的各种宝石<sup>1/4</sup>。另有一些努比亚人在埃及高级官吏的家宅里当仆人,在属于神庙的土地上或者在王宫的手工作坊中劳作。第一中间期社会治安逐渐恶化,这些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且忠厚老实的努比亚人便充当起地方权贵的私人保安。在中王国和第二中间期的许多墓地,考古人员都发现了这些人建造的坟墓,说明他们的居住范围渐趋分散<sup>1/2</sup>。新王国建立后,国王的卫队以及巡视埃及边境的类似边防警察的士兵主要由努比亚人充当<sup>3/4</sup>。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早在第一中间期,有些努比亚人已经融入到埃及社会中。他们与埃及人通婚,按照埃及人的习俗建造坟墓,制作墓碑并在墓碑上刻写自传<sup>⑧</sup>。从保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一块墓碑上可以了解到,一个努比亚男子娶了一个埃及女子为妻,他们生育的儿子又与一个努比亚女子结婚<sup>⑨</sup>;从另一块墓碑上得知,一个叫尼努的努比亚人甚至拥有一个名叫盖努的埃及仆人<sup>⑩</sup>。这些细微的线索与埃及神庙和王宫墙壁上将外族视为不共戴天之敌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

在对中王国时期的都城和王陵的发掘中,发现了许多写着西亚人名字的印章,其主人是受雇建筑王宫和王陵的西亚工匠<sup>10</sup>。中王国后期,越来越多的西亚人在王宫、神庙和官吏家宅充当仆人,有专长的手工业者和服务人员尤其受到欢迎,如女织布工、铁匠、水手、园丁、厨师、舞女等。当时埃及语中的“西亚人”与“仆人”几乎成为同义词<sup>11</sup>。这说明了西亚移民低下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说明西亚人可

<sup>1</sup> 丽希苔姆:《古代埃及文学》第2卷,第26—27页。

<sup>④</sup> “帕勒莫石碑”记载,第四王朝的斯奈夫鲁国王仅在一次军事行动中就从努比亚抓获了7000个男女俘虏。艾尔曼:《古代埃及文学》,第12—13页。

<sup>⑤</sup> 丽希苔姆:《古代埃及文学》第1卷,第19—20页。

<sup>1/4</sup> 贝尔:《古代埃及外交中的翻译和埃及化了了的努比亚人》(Lamy Bell *Interpreters and Egyptianized Nubians in Ancient Egyptian Foreign Policy*),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第34—54页。

<sup>1/2</sup> 彼塔克:《盘形坟墓》(Manfred Bietak “Pfannengräber”),《埃及学百科全书》(*Lexikon der Ägyptologie*)第4卷,威斯巴登1982年版,第999—1004栏。从中王国时期的墓群中可以看到外族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他们的墓葬习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得到认可的程度。纽伯瑞:《艾尔—伯尔舍》(Percy Newberry, *El-Bersheh I*)第1卷,伦敦1894年版,附图第15幅。

<sup>3/4</sup> 这个警察队伍在埃及语里叫“m<sub>d3</sub>jj”,意思是来自“m<sub>d3</sub>”的人,而“m<sub>d3</sub>”是努比亚的一个地名。安德鲁:《古埃及的警察》(Guilleminette Androu “Polizei”),《埃及学百科全书》(*Lexikon der Ägyptologie*)第4卷,威斯巴登1982年版,第1068—1071栏。

<sup>⑧</sup> 费舍尔:《第一中间期格布莱恩的努比亚雇佣兵》(Henry G. Fischer “The Nubian Mercenaries of Gebelen during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库什》(*Kush*)第9期,1961年,第44—80页。

<sup>⑨</sup> A.罗布里诺:《概念与模拟:埃及文学中的外国人》(A. Loprieno *Topos und Mimesis Zum Ausländer in der Ägyptischen Literatur*),威斯巴登1988年版,第28页。

<sup>⑩</sup> 埃德华兹·布洛华斯基:《内布普特瑞—门图荷太普二世统治时期阿比斯克的铭文》(Edward Brovarski “Inscriptions from the Time of Nebpetre Mentuhotep II at Abisko”),《萨拉比斯》(*Serapis*)第1期,1969年,第11—33页。

<sup>10</sup> 有关使用外国劳工的埃及机构,参见奎尔克:《中王国时期的国家与劳动力》(Stephen Quirke “State and Labour in the Middle Kingdom”),《埃及学杂志》(*Revue d'Égyptologie*)第39期,1988年,第83—106页。关于西亚人的名字,参见波森耐尔:《第十二和第十三王朝时期居住在埃及的西亚人》(Georges Posener “Les Asiatiques en Egypte sous les XII<sup>e</sup> et XIII<sup>e</sup> dynasties”),《叙利亚》(*Syria*)第34期,1957年,第145—163页。

<sup>11</sup> 海尔克:《奴隶》(Wolfgang Helck “Skaven”),《埃及学百科全书》(*Lexikon der Ägyptologie*)第5卷,威斯巴登1984年版,第984—986栏。考古人员在今黎巴嫩境内发现了埃及第十二王朝国王阿蒙内海特三世和四世赠送比布鲁斯城君主的许多珍贵礼物。彼塔克:《青铜期中期的黎凡特》(Manfred Bietak, *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Levant*),维也纳2002年版,第20—35页。

以从事的职业相当广泛,并且有一部分人拥有自己的房子、土地、仆人,甚至与埃及人结婚<sup>1</sup>。

在中王国时期许多官吏的墓室墙壁上有西亚的商人与埃及人进行贸易的场面。壁画旁的象形文字说明这些西亚人是带着他们的特产来换取所需的物品。从一个官吏的自传中得知,他被国王任命为管理尼罗河以东沙漠的总督,他的职责不在于抵御外族人渗透到埃及人居住的绿地,主要是接待那些经红海远道而来的骆驼商队,并处理与此相关的物品交换事宜<sup>④</sup>。本尼·哈桑的壁画表明,有些西亚人还带着家眷,说明他们可能是迁徙到埃及并打算定居的<sup>⑤</sup>。和平的贸易往来一直存在,小规模迁徙到埃及的外族人也从未间断过<sup>1/4</sup>。到了新王国时期,不少西亚移民或者西亚俘虏的后代进入埃及管理机构的高层,担任行政、军队或神庙要职,个别人甚至受到埃及国王的恩宠。西普塔在位时期,一个叫巴伊的西亚人官至宫廷主管的位置,而另一个叫马赫泊瑞的西亚人被任命为传令官。这两个人后来分别从西普塔那里获得了在王陵谷建造陵墓的特许<sup>1/2</sup>。

从《阿玛纳书信》<sup>⑥</sup>中得知,埃及国王与两河流域、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众多君主保持联系。为了保证巴勒斯坦地方权贵们对埃及的顺从和忠诚,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国王们让他们的王位继承人到埃及,与埃及的王子们一起接受教育,以便他们回到出生地掌握政权以后与埃及保持友好关系。从书信中还得知,至少从图特摩斯三世开始,埃及国王时常与西亚诸国实行联姻政策,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荷太普三世甚至娶了几个西亚的公主<sup>⑧</sup>。

在第十八王朝的遗址中发掘了大量分布广泛的来自西亚的物品。尽管从阿蒙荷太普三世王宫遗址中也发掘出大量陶片,但没有属于迈锡尼文明的陶片;而在这个国王的儿子埃赫那吞的都城遗址中却发现了数以千计明显带有迈锡尼文明特征的陶片<sup>④</sup>。这一现象说明,即使在对外族相对开放的新王国时期,每个国王会因当时国家的需要和个人的喜好采取各不相同的对外政策,这些因人而异的政策与王宫和神庙墙壁上的模式化文字和图画可能大相径庭。

从对待喜克索斯人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古代埃及统治者利用外族这个话题使其政权合法化的用心。此外,对喜克索斯人遗址的发掘说明我们以往的许多观点有待修改或核实。直到若干年前,我们对喜克索斯人的了解都来自古代埃及第十八王朝初期的统治者留下来的宣传性文字和文物以及后期作家以此为基础撰写的古代埃及历史的片断。在《卡摩斯书写板》上,埃及第十七王朝的最后一个国

<sup>1</sup> 乌尔里希·卢夫特:《第十二王朝相关的文献》(Ulrich Luft: *Urkunden zur Chronologie der Spätköniglichen Dynastie*),维也纳 2006 年版,第 150—159 页。谢索斯特二世陵墓工地上的许多来自西亚的工匠将国王的名字作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埃及管理机构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措施,也有一些人出于自愿改名换姓。保罗·J·弗兰德森:《赫卡拉苏和图特摩斯四世的家庭》(Paul J. Frandsen: "Heqarehu and the Family of Tutmosis IV"),《东方杂志》(*Acta Orientalia*)第 37 期,1976 年,第 5—10 页。

<sup>④</sup> 迪特莱弗·弗朗克:《赫卡伊布神庙研究》(Detlef Franke: *Studien zum Heiligtum des Hekaib*),海德堡 1996 年版,第 34—50 页。

<sup>⑤</sup> 纽伯瑞:《本尼·哈桑》第 20—37 页。

<sup>1/4</sup> 在一块来自中王国时期的石碑上,一个在长相和穿着打扮上与埃及人有明显区别的西亚男子坐在椅子上吸水烟,他的埃及妻子坐在他的对面。朗格:《埃及——三千年的建筑、雕塑和绘画》,第 87—89 页。

<sup>1/2</sup> 按照埃及学家的排序,这两个人的陵墓分别为王陵谷第 13 号和第 36 号墓。施塔德尔曼:《底比斯》(Rainer Stadelmann: "Theben"),《埃及学百科全书》(*Lexikon der Ägyptologie*)第 6 卷,威斯巴登 1986 年版,第 465—474 栏。

<sup>1/4</sup> 所谓“阿玛纳书信”是指由西亚诸侯国的君主和两河流域的国王们写给埃及国王阿蒙荷太普三世和埃赫那吞的信。莫兰:《阿玛纳书信》(W. Moran, *Les Lettres d'el-Amarna*),巴黎 1987 年版。

<sup>⑧</sup> 若干书信还告诉我们,在西亚君主的要求或请求下,埃及国王派遣医生、巫师等人员到对方的宫廷。

<sup>④</sup> 克莱恩:《渡过黑色的海洋》(E. H. Cline: *Sailing the Wine-Dark Sea*),牛津 1994 年版,第 31—35 页;彼塔克:《贸易、权力和文化交流》,第 12—43 页。



王卡摩斯把喜克索斯人比喻成霸占了超过埃及一半土地的强盗,并且详尽地描述了自己与喜克索斯国王阿普比斯斗争的情况<sup>1</sup>。第十八王朝的开国君主阿赫摩斯——卡摩斯的弟弟——则用大量的篇幅叙述了自己如何把喜克索斯人驱逐出埃及并把他们修建的都城阿瓦利斯夷为平地的经过<sup>④</sup>。喜克索斯人离开埃及七十多年以后,哈特舍普苏特女王为了让女性登上王位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显得势在必行,也在外族问题上大做文章:“我重建了西亚人(指喜克索斯人)毁坏的一切,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是破坏已经存在的一切。”<sup>(四)</sup>犹太作家约瑟夫斯在其著作中转引了马涅托有关喜克索斯人的描写:“身份不详的侵略者出其不意地从东方进入埃及,他们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们的土地,战胜了我们的君主;他们残酷地对待埃及人,他们杀死了一批人,把妇女和儿童当作奴隶。最后,他们立自己人中一个名叫萨里提斯的人为国王。他在孟斐斯加冕,从上下埃及收取赋税,并且在各地驻扎了军队。”<sup>¼</sup>

随着在阿瓦利斯挖掘工作的进展,对喜克索斯人如何来到埃及、何以能建立自己的王朝、以何种方式离开埃及等问题可以作出一个全新的回答。喜克索斯人的都城阿瓦利斯所在的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地区一直到第一中间期几乎没有固定的居民点<sup>½</sup>,为了有效地控制从西奈和西亚地区来的移民,埃及第九和第十王朝的统治者开始在这个地方安置居民,阿瓦利斯正是为了安置这些人而建立的城市<sup>¾</sup>。大约50年后,第十二王朝的开国君主阿蒙内海特一世在同一地方建立了新的定居点<sup>⑧</sup>。考古学家在属于第十二王朝的居住层发现了大量来自西亚移民的痕迹,这些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生活 and 宗教习俗。此外,从发现的造船基地遗址和墓葬品中包括武器的事实来看,这些人的职业是水手、手工业者或士兵<sup>(十)</sup>。他们居住过的房屋结构也显现出巴勒斯坦北部和叙利亚地区的传统风格。与埃及人的墓葬习俗不同,这些人的墓地一般靠近居住区,且附近有埋葬驴的墓坑<sup>⑩</sup>。一些坟墓在规模和随葬品数量方面明显超出其他坟墓,这说明,一些西亚人的后裔借助他们的语言能力和对西亚地理情况的了解而进入了埃及管理高层<sup>10</sup>。他们率领埃及商队去西亚地区进行贸易活动或参加对西亚

<sup>1</sup> 哈巴齐:《卡摩斯的第二块石碑》(Labib Habachi, *The Second Stele of Kamose*), 格吕克施塔特 1969年版,第11—19页。

<sup>④</sup> 艾尔曼:《古代埃及文学》第301—305页。

<sup>(四)</sup> 伽丁纳尔:《戴维斯所抄写的阿特米德斯洞穴庙宇中的铭文》(Alan H. Gardiner, “Davies’ s Copy of the Great Speos Artemidos Inscription”), 《埃及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第32期, 1946年,第43—56页。公元前19世纪末,埃及由于王位继承问题而出现了内乱。在成文于第二十王朝初期的“哈里斯纸草”里,拉美西斯四世把这一动乱的原因归在西亚人头上。埃里克森:《哈里斯纸草一号》(Wolfgang Erichsen, *Papyrus Harris I*), 布鲁塞尔 1933年版,第91页。

<sup>¼</sup> 约翰·范·塞特斯:《喜克索斯人:一项新的研究》(John van Seters, *The Hyksos: A New Investigation*), 纽黑文 1996年版,第55—57页。

<sup>½</sup> 除了阿瓦利斯和台尔-法拉萨等少数几个城镇以外,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西亚人的定居点基本上都是喜克索斯政权建立以后才逐步形成的。阿斯顿:《戴尔-埃尔-达巴》(David A. Aston, *Tell el-Daba*), 维也纳 2004年版,第20—23页。

<sup>¾</sup> 第十王朝一个叫夏提的国王在三角洲东北部建立了定居点,并称其为“连接夏提两条路的领地”。彼塔克:《古代埃及的房屋和宫殿》(Manfred Bietak, *Häuser und Palast in alten Ägypten*), 维也纳 1996年,第189—231页。

<sup>⑧</sup> 彼塔克:《阿瓦利斯——喜克索斯人的首都》,第70—72页。名为“连接阿蒙内海特两条路的领地”。

<sup>(十)</sup> 在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男人墓中发现了作为随葬品的武器,如战斧、匕首、矛。几乎所有这些武器从起源上说来来自西亚。瑞内伊主编:《埃及、以色列和西奈》(Anson F. Rainey, *Egypt, Israel Sinai*), 特拉维夫 1987年版,第121—134页。

<sup>⑩</sup> 古代西亚有身份的人出行的时候坐在由两头驴驮负的座椅上。麦戈文:《喜克索斯人的外交》(Patrick E. McGover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Hyksos”*), 牛津 2000年版,第21—33页。

<sup>10</sup> 在其中一座墓中发现了墓主生前佩戴过的印章戒指,上面刻写着墓主的头衔和名字“掌管外国的官吏索白克恩哈特”。死者使用的是埃及人的名字,但是他的墓室的结构和墓葬品表明他是西亚人的后裔。奥莱恩:《喜克索斯问题——历史和考古方面的新前景》(Eliezer D. Oren, *The Hyksos: New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费城 1997年版,第345—349页。

的惩罚性军事行动。很明显,第十二王朝的统治者重新建立定居点的主要目的不是在于控制西亚来的移民,而是在于利用西亚来的技工和廉价劳动力对西亚进行掠夺性的扩张。

在阿瓦利斯发现的第十二王朝末代君主耐佛索白克祭殿遗址出土的物品包括一个雕像,属于第十三王朝一个名叫霍尔哲约太夫的国王,他有一个称呼,叫“阿奥穆-萨”,象形文字意为“西亚人的儿子”<sup>①</sup>。这个称呼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居住在阿瓦利斯的西亚人与以黎什特为都城的第十三王朝统治者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其二,西亚人原来只能充当士兵或者仆人,但到了第十三王朝,他们的后代已经进入埃及政权的高层,有的甚至登上了王位。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呢?难道西亚人借助了武力手段吗?应当说,古代埃及的第十二王朝是法老历史中最为辉煌的一段时间,但在其末年因为缺少直系男性王位继承人而陷入混乱;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掌握大权的官吏便趁机篡夺了王权<sup>②</sup>,其中有一个国王的名字叫阿梅尼-阿奥姆,象形文字意为“西亚人阿梅尼”。这并不是说第十三王朝已经是外族在埃及建立的王朝,而是长期居住在埃及的西亚人逐渐掌握权力<sup>③</sup>。

约公元前1700年,一个至今不知姓名的西亚人在尼罗河三角洲距阿瓦利斯不远的地方称王。他的儿子纳赫希后来把阿瓦利斯定为都城<sup>④</sup>。这个小王国有可能是趁当时中央集权制衰落的时机建立起来的若干小国当中的一个。尽管是小王国,它已具备了成为埃及权力中心的天时地利。阿瓦利斯一直是连接埃及与西亚的重要军事和贸易中心,这里不仅有港口和造船基地,还有兵营。因为王朝的建立者是西亚人的后代,越来越多的西亚人迁居到阿瓦利斯<sup>⑤</sup>,同时,巴勒斯坦地区成为喜克索斯王朝重要的贸易伙伴<sup>⑥</sup>。“喜克索斯”是希腊人对埃及语“外国统治者”一词的音译<sup>⑦</sup>。可见,“外国统治者”这个概念与约瑟夫斯所传达的一个民族作为入侵者的概念大相径庭。换句话说,古代埃及人使用的喜克索斯这个称呼强调了这个朝代的掌权者属于外族,而没有说这个朝代是由一个外族用武力征服埃及以后建立起来的<sup>⑧</sup>。

约公元前1650年,底比斯的地方权贵英特夫将分散在上埃及的若干小国统一起来,建立了第十七王朝,其最北的域界直抵阿西尤特<sup>⑨</sup>。卡摩斯去世后<sup>⑩</sup>,年仅5岁的弟弟阿赫摩斯登基。他18年以后才得以率军向阿瓦利斯进发。根据约瑟夫斯的记述,埃及人包围阿瓦利斯城很久,却无法攻克它,

<sup>①</sup> 彼塔克:《古代埃及的房屋和宫殿》,第121—135页。

<sup>②</sup> 一个国王的名字为梅尔梅沙,埃及语的意思是“军队将领”,这说明军人掌握了王权。

<sup>③</sup> 随着下埃及动荡的加剧,第十三王朝的统治者迁都到位于上埃及的底比斯。

<sup>④</sup> 彼塔克:《古代埃及的房屋和宫殿》,第89—93页;彼塔克:《阿瓦利斯——喜克索斯人的首都》,第75—79页。

<sup>⑤</sup> 在属于第十四和第十五王朝的考古层,考古人员注意到居住区域呈现不同寻常的扩张趋势。彼塔克:《古代埃及的房屋和宫殿》,第100—109页。

<sup>⑥</sup> 考古人员在巴勒斯坦南部发掘出古城莎卢恩的遗址(位于今加沙以南7公里的地方),出土物品不可争辩地显示该地与阿瓦利斯之间的特殊关系。

<sup>⑦</sup> 艾尔曼:《埃及语词典》第3卷,柏林1961年版,第171页。

<sup>⑧</sup> 在阿瓦利斯出土了许多来自爱琴海地区的陶器等物品,说明不能把喜克索斯王朝视为完全由西亚人建立的政权。彼塔克:《古代希腊神庙与埃及》(Manfred Bietak *Archaische griechische Tempel und Ägypten*),维也纳2001年版,第21—35页。

<sup>⑨</sup> 英特夫与第十三王朝王室成员的一个女性后裔结婚,可能是试图以此来为他对整个埃及行使统治权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sup>⑩</sup> 对这个国王尸体的检查证明他死于脑部一处重伤,有学者猜测,他很有可能是在与喜克索斯人战斗中受伤。海尔克:《第十八王朝军队将领所发挥的作用》(Wolfgang Helck *Der Einfluss der Militärführer in der 18. ägyptischen Dynastie*),莱比锡1939年版,第18—23页。

最后不得不同意喜克索斯人从城中撤出并回到巴勒斯坦。考古发掘表明,阿瓦利斯并没有像埃及国王所声称的那样被烧毁,王宫一带仅有的火烧痕迹也被证明是喜克索斯人撤退以后造成的<sup>1</sup>。考古发掘进一步说明,在西亚人撤出阿瓦利斯以后,阿赫摩斯在喜克索斯人王宫废墟上建造了新的宫殿<sup>④</sup>。这显然是胜利者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具有米诺斯文化特征的王宫壁画说明埃及统治者仍然使用了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艺术家<sup>(四)</sup>。

喜克索斯人从西亚把马和马拉战车引入埃及,埃及人学会了使用马和马拉战车<sup>1/4</sup>,并最终借此战胜了喜克索斯人。在阿拜多斯发现的一块浮雕也证明了这一点<sup>1/2</sup>。埃及军队与西亚人作战时使用的武器也有不少是西亚人带到埃及的。第十八王朝初期,来自西亚的熟练工匠仍然在阿瓦利斯的武器制作坊工作<sup>1/4</sup>。阿瓦利斯此后成为埃及军队继续打击西亚人残余并且进一步向巴勒斯坦地区进行扩张的前哨。埃及国王旨在打击喜克索斯残余和控制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无疑对西亚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后来传说与历史事实的相互交融使得犹太作家约瑟夫斯将喜克索斯人被逐出阿瓦利斯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联系在一起<sup>⑧</sup>。而在埃及,随着王朝后期国势的衰落和外族入侵与征服的频繁发生,埃及人也不可逆转地对外族怀抱消极和仇恨的态度。在许多文献里,西亚人被说成疾病的携带者和传播者,埃及语将腺鼠疫称为“西亚病”,喜克索斯人则变成了“麻风病患者”<sup>(七)</sup>。

综上所述,由于古代埃及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他们对于外族和外国持有一定的优越感,同时也不乏恐惧感;这种态度随着他们的视野的扩大和与外界交往的增多而开始变化。相比之下,统治阶层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而把外族问题格式化并上升到政治层面和宗教层面。尽管统治者出于实际需要与外族和外国进行过相当频繁且形式多样的交往,这种服务于权力运作的政治性宣传把埃及与外国置于两个对立的极端。国王是保卫埃及人免受外族奴役的英雄,并且借助宗教手段把埃及与外国之间的敌对关系神圣化。考古发掘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古代埃及与外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信息,并且正在纠正我们此前由于文献的不足或者由于古代埃及文献的倾向性而得出的不正确的结论。事实证明,古代埃及并不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文明,埃及在技术方面、宗教方面、文学方面,甚至在军事方面的进步都离不开与外族的交往。

[本文作者金寿福,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郭子林)

<sup>1</sup> 城中的塞特神庙也没有被摧毁。彼塔克:《阿瓦利斯——喜克索斯人的首都》第37—39页。

④ 彼塔克:《阿瓦利斯——喜克索斯人的首都》,第13—18页。

(四) 戴维斯:《埃及》(Vivian Davies Egypt),伦敦1998年版,第120页;彼塔克:《古代希腊神庙与埃及》,第14—19页。

1/4 海尔克:《第十八王朝军队将领所发挥的作用》,第54—67页。

1/2 苏特兰:《技术变化的社会环境:公元前1650年至前1550年间的埃及与近东》,第11—19页。

1/4 第十九王朝起源于阿瓦利斯一带,而这个王朝的保护神塞特具有很强的西亚神的外部特征。

⑧ 阿斯曼:《古代埃及的战争与和平》(Jan Assmann, “Krieg und Frieden in alten Ägypten”),《曼海姆论坛》(Mannheimer Forum)第31期,1983年,第134—140页。

(七) 阿斯曼:《埃及人摩西》(Jan Assmann, Moses der Ägypter),慕尼黑2000年版,第23页。

# **SUMMARIES OF ARTICLES**

## **Herodotus The Invention of History and the Discourse over Alien Cultures**

Huang Ya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ssess Herodotus' achievements within the history of Greek thought and to illustrate the perspective from which he writes his Histories. History in the sense of historiography is not a natural result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is created against specific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s far as ancient Greece is concerned, the emergence of rational thinking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creation of history out of myth. Herodotus built on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lready manifested in Hecataeus and created the Western historical tradition. Through a narrative of alien cultures, he revealed to the Greeks a world consisted of two opposing parts, Greeks and barbarians, and thus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tradition of east-west polarization in history writing.

## **The Ancient Egyptians' Concepts of Foreigners**

Jin Shoufu

The ancient Egyptians' concepts of foreigners were influenced by their geographical and climatic environments in the early tim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ingship, the rulers tried to employ the topic of foreigners politically and religiously to legitimate their power. By studying the propagandistic material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kings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results, we can ge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Egyptians and their neighbors.

## **Greek Identity in Macedonian Imperialism**

Xu Xiaoxu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and Alexander the Great,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k identity was complicated. Macedonian imperialism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circumstances where Greek identity was constructed. It largely reduced the Greeks to the anti-Macedonians and the pro-Macedonians. Anti-Macedonian Greeks denied the self-claimed Greek identity of the Macedonian royal family, while pro-Macedonian Greeks defended it. The Macedonian royal family, identifying themselves Greeks and Macedonians, possessed a dual ethnicity. Both the Greeks and the Macedonians thought that they wer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nly anti-Macedonians definitely referred to the Macedonians as barbarians. In practice both the